上接《E1

汉化、胡化、洋化还是全球化?

再说“火枪”(下)

《兵录》一书共 14 卷,约 25 万字,附图 484 幅,其中《西洋火攻神器说》一章,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西方火炮技术的专著之一。该书介绍了各种西洋火炮的形制尺寸、弹药用量、铸造技术和弹道射程等事,还绘有数幅铳规的使用图。在中国古代兵书中,此书最早记载了近代步枪的雏形——燧发铳(扳机击发式火绳枪)。《西洋火攻神器说》一章于 1799 年译成日文,为日本武器专家所取法。

明万历年间(1573~1620 年),从西域来了一批土耳其人,代表土耳其苏丹朝见明廷。自从 1453 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占领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的地盘后,土耳其人控制了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命脉。经过考证,这些来华的土耳其人是一些商人,也包括中亚几个小国来中国交易的商人。朝贡贸易对他们很划算,可得到丰厚利益,而中国的朝廷和民间对其带来的商品并不太感兴趣。

但他们献给明廷的新式火枪鲁密铳,射程远,穿透能力更强,引起了万历皇帝的关注,下令把这些武器交给工部的军事专家赵士桢,由他进行记录和研究。赵士桢非常有心,这些火枪的前后侧面、重量、细小部件及扳机,还有实战中怎么使用等,他都记得很详细。

万历二十六年(1598 年),赵士桢根据土耳其人传授的方法,对西洋鸟铳、日本鸟铳和新传入的鲁密铳加以研究改进,制造出鲁密鸟铳。这种火器弹药装填量高,射程远,威力比同期其他火绳枪都更大,堪称当时世界上威力最大的火绳枪。当时适逢东北的满洲人兴起,这些新设计的武器,显著提高了御敌于山海关外的明军的战斗力。

此后,赵士桢又设计出新的火绳枪,枪身比较短,单个士兵用起来更方便,因发射速度快,又是多发型,对付骑兵特别有效,大型的铳能把对方骑兵的马直接打翻。再加上盾牌防护,组合成那时候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攻防装备,本方的士兵刀枪兼备,敌人却射不到你。但这类武器的缺点是装弹不方便,需要同伴提供防护。还有一种体量更大的“阴阳炮”,一个人抬不动,对付敌人的重装骑兵,较远距离外可以发挥强大打击作用。

赵士祯还在火绳枪枪身上装上刀型的配件,作用相当于后来的刺刀。欧洲的火枪配上刺刀,出现得比中国晚。

总而言之,明朝因为开发和拥有这些新型武器,保证它在统治的最后一百多年里军事上的相对优势。后来,清兵屡次试图入关,明军就是靠先进火器抵抗,将清兵阻挡在关外几十年。

明朝人对引进的西方军事技术,到底中国人自己合用不合用,曾写成专书,结合实战,从感性上提高了对火器效能和功用的认识。就算是普通老百姓,也能从公开印行的这些著作中获得军事知识。

而早在 1799 年,即明治维新前半个多世纪,日本的武器专家就对以火器为主的军事新技术高度关注,研究这些新式武器到底怎么使用,由于对不同武器有不同认识,自然影响其军队走上不同的战略方向。

“军事革命”小国造

莫里斯亲王执政时,荷兰不过是欧洲一个小国,全因火器运用的战术得当,才迅速在军事上逞强,很快欧洲其他国家也学会了。

十六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以火器创新为标志的近代早期军事革命,导致战斗方式的改变以及军队组织的重大调整。当代有名的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说过:

在莫里斯亲王(Prince Maurice)发明的三排轮射法训练中,“单个步兵的灵巧身手和坚定意志已经几乎不起作用;个人的勇敢和胆量在不可更动的例行常规面前也几乎完全消失。戎马生涯呈现出新的曲貌,军队的日常生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已故的英国近代史学者迈克尔·罗伯茨,早在 1955 年即提出“1560~1660 年间军事革命”之说,他认为在此时期内,尼德兰(今属荷兰)的莫里斯亲王和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夫国王采用了火枪多层齐射的新战术,并为之改变了军队组织形式,引发一场“对欧洲未来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像一座分水岭把现代世界与中世纪社会分隔开来”的“军事革命”。该观点提出后,在西方军事史学界引起了一场延续半个世纪的争议。

火器的普遍使用,被称为“火药革命”。这个革命意义深远。《大英百科全书》说:“从技术上来说,火药是跨越中世纪和近代之间鸿沟的桥梁。”火药革命导致了整个军事的变革,理由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应当特别强调的是,从装刺刀的枪起到后装枪止的现代作战方法,在这种方法中,决定事态的不是执马刀的人,而是武器。”马克思也评论说:

“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我们读《三国演义》,印象中古代的战争就是两帮人马列阵对峙,各排着长队,主将出战,使出十八般武艺,大战三百回合,胜了己方的兵马一拥而上,敌人仓皇败退。人多势众,特别讲究人海战术,敌众我寡者自然处于不利形势。但有了火器后,这种人海战术的优势就消失了。人家一阵火枪密集射击过来,本方阵势就乱了,人人唯恐吃枪子,于是纷纷四散逃命去也。

古代战争中,步兵不如骑兵,因为后者有更强的机动性。火枪登场之后,步兵对付骑兵就比较容易。特别是像鲁密鸟铳这种重型火绳枪,连铁甲都可以穿透,人马的血肉之躯就更不用说了。骑兵遇到火器密集射击,人马都只好退避三舍。

但火枪在战场上使用也有很大的麻烦,因要点火发枪,操作过程相当复杂。你得把火药装进枪管,用通条疏通,塞进铅丸作为子弹,瞄准目标,扣动枪机,打一枪得两三分钟。而对方发射弓箭,熟练的射手一分钟至少射两箭,你枪还没装好子弹,对面的敌人就把你一箭射倒,或者在盾牌掩护下冲将过来,砍掉你的脑袋。怎么办?

于是在规模较大的战争中,拥有最好的战争武器的一方,也得知道如何合理运用。由西方人那里引进火器的日本人,在频繁的内战中很早就意识到战术上的问题。日本军人采取的基本战术是“信长三段射”,即设三排士兵,第一排专门放枪,第三排专门装火药和铅丸,第一排放完枪后,把空枪转给第二排,同时第二排一手把空枪转给第三排,另一手把第三排已装好并且递过来的枪转给第一排,第一排接过装好的枪后立即瞄准射击。

这样一来,战阵上士兵就可以做到连续射击,形成火网,使得敌人无机可乘。欧洲人也做了类似的布阵,做得最好的是荷兰莫里斯亲王(1567~1625 年),他执政时荷兰不过是欧洲一个小国,全因火器运用的战术得当,才迅速在军事上逞强,很快欧洲其他国家也学会了。威廉·麦克尼尔由此断言说:有了这种新武器的军队,将会变成准确的机器,军队的战斗力就完全改变了。

清承明制多“遗产”

在军事技术的全球化交流拓展方面,清朝比不上明朝。不过,清朝充分利用了明朝军事改革留下的遗产入主中原,并创造了后来一番开疆拓土的宏伟功业。

过去我们认为,明代中国的火器技术和战术,主要是从日本传入的,实际上明朝军队自己也有创造。比如明军火器部队列阵,也是分三排,第一排专门放枪,第二排传递,第三排则装弹药,前排士兵打完后,后面的同伴轮流接过来。这与日本的“信长三段射”及荷兰莫里斯亲王的三排轮射方法,原理基本一样。我相信,那是从中国固有的“弩三排轮射法”转化而来的。

综合起来说,十六世纪以来的世界近世军事变革,不仅因为欧洲内部的长期战争所激发,在东亚和西亚其实也出现了类似的变革,尽管变革的方式和程度不一样。有的西方学者认为,明代中国也出现了与西方非常相似的军事革新。因此,近代早期军事技术的重大进步,东西双方都做出了贡献。

可以说,那个年代军事技术的革新,以及军队组织指挥能力的提高,不是东方或西方哪个国家独有的发明,大家接触到新技术、新战术,都可以使用。就像现在通行的互联网,或普通的日常用品,如我们穿的衣服,用上了就变成我们的了,不要在乎“汉化”“胡化”还是“洋化”,其实这就是“全球化”。

再补充一句,明朝中后期在军事技术变革上所做的积极努力以及留下的遗产,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了实际的历史进程。取其而代之的清朝,在军事技术的全球化交流拓展方面,反倒没有更大的进步。不过,清朝充分利用了明朝军事改革留下的遗产入主中原,并创造后来一番开疆拓土的宏伟功业。若是没有明朝后期军事变革所积累的一切,清朝能不能实现盛世辉煌,还很难说呢。

有名的军事史学家杰里米·布莱克就说过:

(在十八世纪的世界)在陆地上,最有活力的国家和最成功的军事强国是中国。中国在十七世纪下半期开始扩张,占领了台湾(1683 年),把俄国人逐出了阿穆尔河流域(1682~1689 年),战胜了准噶尔人(1696~1697 年)。在十八世纪,中国继续着此过程,于 1700~1760 年间,最终解决了准噶尔问题,控制远至拉萨和巴尔喀什的广大地区,合并了新疆。中国 1766~1769 年间对缅甸的军事行动不太成功,但是当尼泊尔的喀尔喀人开始扩张并挑战中国在西藏的地位时,1792 年中国军队前进到加德满都,迫使喀尔喀人承认中国的权威。在此时期,中国还镇压了许多规模大的叛乱。

明代名画家仇英的《倭寇图卷》,现藏日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它反映的是嘉靖年间明军对抗倭寇入侵,最终获胜的情境。图片转引自许倬云著《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

汉化、洋化、现代化

最后,回到本次演讲最初讨论的“汉化、胡化、洋化、全球化”议题,我们不能狭隘地使用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去看待历史和复述过去。

十八世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中国,最强大的陆军是清军,这可能是我们过去想象不到的。而这支军队之所以强大,很大程度要归功于晚明军事改革创建出来的火器部队,即清朝八旗中的汉军。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即指出:

“满洲语所称汉军为‘乌珍超哈’(重火器兵)而不称为‘尼堪超哈(汉兵)’者,推其原故,盖清初夺取明室守御辽东边城之仿制西洋火炮,并用降将管领使用,所以有此名号。”

在清朝统一中国的战争中,清军火器方面的绝对优势是关键因素之一。在归顺的汉人帮助下,清军入关前夕所铸成的“神威大将军”炮,技术上已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由汉军组成的炮兵部队,与满蒙骑、步兵密切配合,以摧枯拉朽之势,在短短数年中横扫中国,建立起一个新的强大帝国。

清朝统一之后,汉军八旗继续在清朝军队里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钱穆等前辈学者已指出,八旗军中,满洲八旗在全国统一之后不到二十年,就基本上不怎么能打仗了。蒙古八旗大部分驻守蒙古,虽然还有一定的战斗力,但并不是历次战争的主力。清朝前期的大战役,主要是依靠汉军八旗打的。在这些战役中,最关键的、最耗时、打得最艰苦战争,是与准噶尔人的战争。

准噶尔是当时欧亚大陆上最强大的游牧帝国,它统治的地方从中国新疆、西藏一直到中亚。准噶尔军队是中亚最强悍的军队,清朝花了一百多年才把准噶尔打败,主要也得益于火器,尤其是大炮发挥了重大作用,成为清军取胜的利器。

从清初宫廷洋画师郎世宁留下的画作可见,在清军与准噶尔军会战之时,准噶尔人使用了火枪,而清军使用了火炮。清军先用炮轰,之后骑兵出击。清朝在军事上的成功,倚重的就是以火器为主战装备的汉军八旗,而汉军八旗正是明朝军事改革遗产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从西方传来的火器,经明朝采纳改良,又为以“外夷”身份入主中原的清朝所用,这到底是“汉化”,或是“胡化”还是“洋化”,无人能够说得清楚。

最后,回到本次演讲最初讨论的“汉化、胡化、洋化、全球化”议题,我们不能狭隘地使用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去看待历史和复述过去。放在全球化的广阔视界中,任何一个“民族”都有长期融合的过程。自汉朝有“汉人”以来,两千余年间,大量非“汉人”的血统和基因,都汇聚在我们的血液里面了。

一句话,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的祖先虽然来源多元,但我们都生活在这片辽阔而厚实的土地上。

作者为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兼任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曾任香港科技大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兼任哈佛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东京大学、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与美国国会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等多所名校及学术机构的客座教授(研究员)。有《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等著作若干种。本文为作者日前在北京由首都师范大学、台湾中正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三校历史学院(系)联合举办的第六届“汉化·胡化·洋化: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由本报记者谭洪安根据现场记录整理而成,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历史复盘 》

郑氏集团:曾经的“东亚海上第一强”

文 / 李伯重

晚明军事改革运动不仅限于官方的努力,民间也在积极进行,而且成就斐然,主要产物就是明末福建郑氏集团(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建立的海上武装。

郑氏武装是一支不同于往昔的新式海上武装。郑氏水师中有大熕船、水艍船、犁缯船、沙船、乌龙船、铳船、快哨等各式战船。过去一些学者依据中文史料,对郑氏海上武装的战船与火炮进行了研究,指出其主力舰只——大熕船、水艍船——采用了福船(闽浙沿海尖底海船的通称)、西洋夹板船的特点:

阔一丈六尺,高六七丈,吃水一丈二尺;船上楼橹以铁叶包裹,外挂革帘,以防地方炮弹;船上装有火炮,船中部有风门施放炮弩;两旁有水轮,士兵可以在船舱内踏轮前进,不惧风浪;每船能容兵 500 名。

可见这些战舰具有相当好的航行和战斗性能。但比起郑氏集团主要对手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主力战舰夹板船,则颇为逊色。荷兰在亚洲建造的夹板船,长三十丈,高六丈,桅杆厚二尺有余,五桅三层,帆樯可八面受风,船速较快,不惧逆风;船两侧设有许多小窗,可放置小铜炮,甲板上安放两丈长的巨炮,每船置各种炮二三十门;还装有照海镜,作为瞄准之用。

相比之下,郑军每艘战舰上只装有两门大炮,火力远远不及荷兰战舰,郑军战舰高度仅为荷舰的 1/3,在海中相博时,往往被荷兰舰船撞翻或被压沉。

中国学者的这些看法,受到所见资料的限制。他们只引用中文史料,而中文史料有关的记载比较片面。特别是对荷兰方面的看法,大多源于第二手资料,得出的结论也有偏颇之嫌。

最近美国学者欧阳泰(Tonio Andrade)在其新著《1661,决战热兰遮》中,运用中文、荷兰文和其他西方文字的文献资料,对郑、荷双方武器装备情况进一步分析后指出:

“郑芝龙采用荷兰的科技,打造了一支新的舰队,主力是 30 艘按欧洲式设计建造的巨大船只,每一艘都有两层经过强化的大炮甲板,可以架设 30 或 36 具大型火炮——和荷兰战舰一样多,而大部分的中式帆船只能架设 6~8 具小型火炮。这些新式的战船甚至具有欧式炮门,并设有滑动炮架,上面装着环钉与绳子,能够拉向后方以装填炮弹。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创新。西班牙无敌舰队在 1588 年之所以会被英国击败,就是因为缺乏这样的构造。(荷兰舰队司令)普特曼斯对此深感惊艳:‘在这个国度,从来没有人见过像这样的舰队,有着如此精美、巨大而且武器犀利的中式帆船’。”

欧阳泰认为,“荷兰的优势并不在于大炮与火枪。如同揆一(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最后一任长官)所承认,中国军队的大炮威力并不逊于荷军。台湾的一名学者指出,只要对国姓爷(郑成功)的火炮及其使用方式加以分析,不免令人‘讶异于他麾下军队的现代化程度’”。他继续论述道:

“荷兰的火枪部队虽然采用本国发明的排枪射击法,能够达成连续致命效果,但面对国姓爷的部队却无用武之地。实际上,中国早在两百多年前就发展出排枪射击的方法,国姓爷的士兵训练精良、纪律严明。又受到妥善的领导,因此荷军部队的阵式无可避免地溃散,导致人员四散奔逃。”

明亡之后,郑氏武装是东亚世界唯一能够对清朝构成重大威胁的力量。1658 年(清顺治十五年,南明永历十二年),郑成功统率 17 万大军与浙东张煌言部会师,大举北伐。大军进入长江之前,于羊山海域(今浙江舟山大洋山岛)遭遇飓风,损失惨重,只得退回厦门。次年,郑成功再次率领大军北伐,会同张煌言部队顺利进入长江,一度包围南京,一时江南震动。后因中了清军缓兵之计,意外遭到突袭,招致大败,唯有再次全军退回厦门。

尽管如此,郑氏集团依然是清朝的最大对头,明亡后抗衡清朝达二三十年之久。郑氏海上武装是一支堪与当时世界海上霸主荷兰的舰队相媲美的海军。郑氏所做的尝试,可以说是晚明时期朝野精英人士为创建新式军队所作努力的一个重要成果,也是早期全球化时代,中西军事技术碰撞交流与勉力变革的一宗精彩案例。

本文节选自李伯重教授近作《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三联书店 2017 年 1 月初版)。

海淀工商分局积极开展房地产经纪机构专项整治

为了净化首都房地产经纪行业市场,规范房地产经纪的经营行为,海淀工商分局近期大力开展房地产经纪机构专项整治行动。海淀工商分局召开了专项工作部署会,要求结合辖区实际情况,严格落实各项执法检查工作,切实做好此次房地产经纪机构专项整治工作。

一是检查房地产经纪机构是否在经营场所明显位置公示房地产经纪服务内容、服务标准;

二是严查房地产经纪机构拖延支付客户资金问题;

三是严查利用合同格式条款侵害承租人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

四是严查房地产经纪机构经营过程中存在的合同及其他欺诈行为。

下一步,海淀工商分局还将继续开展房地产经纪机构专项整治工作不放松,严格规范房地产经纪机构行为,深化对房地产经纪机构的行政指导,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辖区秩序稳定协调发展。

红盾之窗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专栏